

青史 鉴 古今

张剑锋

著

如果慈禧太后背上黄金降落伞——不要把改革做成革命

霸王别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

假如马岱感冒了——从锦囊妙计说起

胜利的教训——萨英战争启示录

授人以“渔”一定比授人以“鱼”好吗——对雍正“火耗归公”改革的反思

青史
古今



青史 鉴古今

张剑锋
著

如果慈禧太后背上

革做成革命

霸王别姬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

假如马岱感冒了

——从锦囊妙计说起

胜利的教训

——萨英战争启示录

授人以“渔”一定比授人以“鱼”好吗

——对雍正“火耗归公”改革的反思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史鉴古今/张剑锋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035-4817-8

I. 青… II. 张…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4620 号

青史鉴古今

责任编辑 曲 炜 武 帅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 巍

责任印制 王洪霞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137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目 录

有人说中国历代改革多以失败告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古代改革者们的酸甜苦辣能够给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哪些经验教训？

如果慈禧太后背上“黄金降落伞”

——不要把改革做成革命 /3

释放阀还是导火索

——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看改革的时机选择 /9

为什么是明治维新而不是幕府维新

——再谈改革的时间窗口 /15

民不加赋，国用能不能饶

——谈改革的制度瓶颈 /20

天变到底足不足畏

——改革的权力也需要制约 /26

从削藩到推恩

——改革者应当学会与各方共舞 /31

*

*

*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唐太宗的觉悟。今天的我们对以史为鉴的理解又是什么？是否应该超越一千多年前的古人？

刑鼎的奇怪与不奇怪 /39

霸王别姬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 /46

和亲与“巧实力” /61

蜀汉何以亡耶 /67

假如马岱感冒了

——从锦囊妙计说起 /73

桓温北伐与《星球大战》 /77

盛世危言 /85

世人都晓战略好 唯有近利忘不了

——谈李密为什么不先入关中 /92

黄巢与朱温

——挑战者的启示 /98

静静的高粱河 /102

张邦昌该不该判死刑 /107

牢记历史应该记住些什么

——从“海上之盟”和“联蒙灭金”谈起 /112

柯尔培尔：17 世纪的法国郑和 /118

俺答求贡 /124

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 /143

胜利的教训

——萨英战争启示录 /150

回到原点谈辛亥 /155

无畏舰的启示

——要学会战略性思维 /162

*

*

*

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古人的智慧或是失误能给我们今天的制度建设提供哪些启发？

“八毛”事件与扁鹊见蔡桓公

——谈信任从哪里来 /169

干部为什么能上不能下 /175

- 从雪夜取蔡州到杯酒释兵权 /180
朱元璋反腐败的教训 /187
从考成法改革看微观机制的重要性 /195
驻京办、掣签法与“影响成本” /199
授人以“渔”一定比授人以“鱼”好吗
——对雍正“火耗归公”改革的反思 /204

*

*

*

从辉煌到衰落，中国古代经济一直给人以谜一般的感觉。因为难以归类，马克思专门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名词。我们今天是否能够破解这个千古谜团？

- 青苗法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谈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 /211
从交子到会子
——谈政府需要自我约束 /217
宋朝经济发展的秘密何在
——对中国传统“抑兼并”政策的反思 /222

后 记 /228



有人说中国历代改革多以失败告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古代改革者们的酸甜苦辣能够给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哪些经验教训？

//////////////////// QINGSHI JIANGUJIN //////////////////////////////////////

- 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慈禧太后就一定不可能支持改革吗？
- 明治维新中的幕府和清末新政中的清政府都主张改革，为什么他们都失败了，而只有明治政府的改革成功了？
- 民不加赋，国用在什么情况下能饶，什么情况下不能饶？改革与制度瓶颈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 “天变不足畏”是一句好口号吗？改革的权力需不需要制约？
- 汉景帝的“削藩”和汉武帝的“推恩”的效果差距为什么这么大？改革者如何才能建立起最广大的改革统一战线？



如果慈禧太后背上“黄金降落伞”

——不要把改革做成革命

公元1898年9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农历八月初四〕上午，从颐和园到西苑（今中南海）的大道上走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皇家队伍——慈禧老佛爷御驾回宫了。正值皇上锐意变法的当口，轻易不回宫的老太后却撵在昨天才从颐和园回宫的青年皇帝后面赶回宫来，这不免触动了诸多关注时局的人们的敏感神经。人们虽然普遍感到紧张，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一天竟是整个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慈禧太后回宫之初倒还没有立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只是宣布光绪皇帝新任命的4名维新派军机章京所签拟的各项文件都要先交给她看。然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此后，一切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以加速度的方式爆发了。9月21日，太后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9月24日，宣布将谭嗣同等一千变法派官员革职治罪。9月27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荣禄，第二



▲ 慈禧太后

天一早，未经审判就下令处决了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的一批变法派官员。10月8日，光绪帝被软禁在西苑瀛台，并在此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残生。同时，慈禧太后也下旨取消了几几乎所有新法，使得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由洋务、维新急剧转为闭关排外。不到两年之后的1900年



6月21日，在洋人要求清朝归政于光绪的刺激下，慈禧太后宣布对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8月16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中华民族一步步走进了灾难的深渊。

对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受康有为等人故意扭曲的影响，传统上常常将其简单归结为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把罪魁祸首的帽子扣在慈禧太后的头上。但这却解释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戊戌变法前期光绪帝所颁发的诸多维新法令都是得到了慈禧的认可，慈禧甚至说“汝（光绪）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辮发不剪，我便不管”。其实，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就支持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活动。而在戊戌变法之后，1901年初，慈禧又亲自发动了被称为“慈禧新政”的清末改革，其政策的激进程度在很多方面（如预备立宪等）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并不是一个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新事物的老榆木疙瘩。那么为什么在戊戌变法时，慈禧会这样坚决地走到新政的反对面，大开历史的倒车呢？其根本原因并不在新旧之争，而是在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之争，以及荣禄等当权重臣与康有为等新晋小臣之争。只不过帝党和小臣们恰好借维新的机会试图夺取权力，而失去理智的后党和重臣们也就连“洗脚水（帝党和小臣）带孩子（新政）”一块倒出去了而已。

现在回头来看，如果双方都以国家大局为重，本来是有可能找到利益的契合点的。维新党人之王的王照曾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慈禧）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然而，光绪和康有为们却见不及此。拿光绪来说，在慈禧对变法仍抱以基本支持的态度时，他却在9月4日趁慈禧不在身边之机突击以小故（拒绝代下属上奏维新建议）罢免了礼部六堂官（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并于次日任命了变法派军机四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这打破了高级官员任免要先行请示慈禧的惯例，直接挑战了慈禧的政治权威。9月13日，光绪又提出了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要求，这实际上是要甩开现有的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机构，另设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决策机构。这既是光绪对掌控原有政权体系的慈禧的挑战，也



是康有为等小臣对当权重臣们的挑战（懋勤殿顾问官不受品级限制，又位当中枢，康有为等小臣可以藉此途径一下子跃居众多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们之上）。这招招进逼的态势，无疑是在把慈禧太后和重臣们往墙角里赶^①。

如果说光绪摆出的架势好歹还是文斗的话，康有为等人就几乎是要全武行干上了。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曾经问康有为新政难以推行怎么办？康有为竟然说：“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要知道，荣禄自己恰恰正是二三品以上大臣，而当时主政的重臣们也都是二三品以上大臣。康有为此话一出，立刻把新党推到了要和重臣们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去。难怪荣禄见人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 光绪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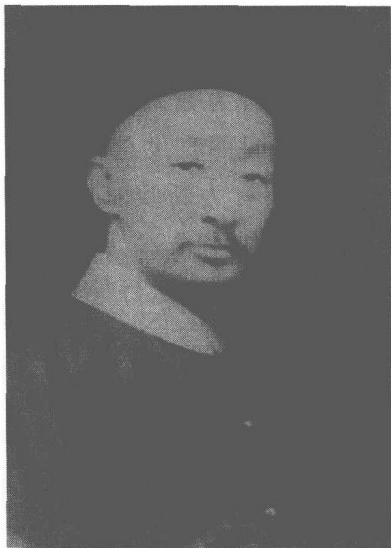
康有为等人不仅与重臣们站在对立面上，而且也使劲把慈禧往对立面推。戊戌变法中，光绪曾经下诏废八股，遭到了守旧派大臣刚毅的阻挠。光绪随即去颐和园请慈禧支持。光绪五月初二去颐和园，初五就得到批准。这本来是与守旧派不同的慈禧支持新政的一个典型体现，但在康有为看来却成了“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正是从这种偏激的角度出发，当9月15日光绪因为开懋勤殿的建议被慈禧否决而心中不快（事实上这可能是戊戌变法以来慈禧第一次明确反对光绪的建议），因此下密诏给杨锐，让军机四章京“妥速筹商”，“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慈禧）意？”的时候，康有为等人竟把脑子转到了诛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慈禧）”。

① 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一书中，茅海建先生指出“从她（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即罢免礼部六堂官和开懋勤殿）”。

后”上，从而发生了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兵变之事。也就是说，在慈禧还没有采取什么实质行动，光绪也还在想着如何与慈禧达成妥协“不致有拂圣意”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开始要刺刀见红了。



▲ 康有为



▲ 荣禄

康有为等人的举动断绝了后党、重臣和帝党、小臣们之间任何调和矛盾的可能。9月19日慈禧刚返回西苑时，还没有采取多少实际措施。她只是预感到政治空气的紧张，要就近监督光绪召见伊藤博文等重大举措而已。到了9月21日，可能听到康有为等人正在密谋于己不利的消息之后，慈禧才宣布重新训政，下旨捉拿康有为。而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慈禧也还没有停止新政，完全倒行逆施。只是到了9月24日，当袁世凯将新党企图“围园劫后”的确凿消息向荣禄、慈禧告密之后，慈禧才开始大开杀戒，软禁光绪，全面清算新党和新政的。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同属向资本主义方向进行变革的努力。其中作为改革的戊戌变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在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变革，而不是与旧制度彻底决裂，拼个你死我活。这种方式，虽然有变革不够彻底等缺陷，但也有可以和平完成变革，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剧烈动荡和暴力所带来的巨大代价等好处。在当时对中国而言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出路。但是，改革中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如



何处理改革与当权派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改革必须要极大地（即使不是全盘的）改变旧制度，一定会涉及思想上的重大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对当权派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又不能把当权派都赶到对立面去，否则不是改革失败，就是必须将变革的剧烈程度由改革进一步升级为革命。戊戌变法是以改革的形式出现的，维新党人们也是按改革来进行的计划和准备（否则他们就应该像孙中山那样全力以赴搞武装斗争，而不是试图用几条诏令来解决问题）。然而，康有为等人却以一种你死我活的方式来对待慈禧和重臣们，不给他们留出路、下台阶。这样做的结果是不难预见的——面临被革命威胁的当权派们在被逼到墙角之后举起了屠刀，而毫无革命准备（除了做一些“扶皇帝登午门”，或皇帝在阅兵时“驰入”袁世凯营中、下诏命袁诛贼臣之类的白日梦之外）的改革派们只能或是逃亡海外或是引颈就戮。用非改革的方式来搞改革，可能这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吧。

说到给当权派留出路、下台阶，西方现代公司治理中倒是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机制，就是“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黄金降落伞”的基本概念是给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以一定保障，当他们因为公司遭到恶意收购而被解职时，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偿。

之所以设置这种机制，其原理是这样的。在西方资本市场中，恶意收购（即该收购并未得到被收购方管理层的支持）常常是一种对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颇为有效的机制。收购方在资本市场上收购经营不善（从而股价较低）的企业，通过更换管理层、调整发展战略、改善管理等措施，来提升企业价值。企业价值提高后，股价也会随之上涨，收购方则从中获利。这样的收购对收购方、被收购企业和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但对被收购企业的原管理层就是飞来横祸了，因为新老板入主后的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把他们炒掉。因此，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遇到恶意收购时，常常不惜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全力抗争，例如出售企业的核心资产、提前偿债以造成企业的财务危机等等，大有搞焦土抗战的味道，虽然焦的不是管理层自家的土（而是股东的土）。“黄金降落伞”的设置，就是为了给原管理层留一条退路，让他们能够更容易接受恶意收购、与收购方达成妥协，不去利用手中职权来损

害公司利益，为公司在收购后的重组和价值提升铺平道路。“黄金降落伞”虽然需要支出一些成本，但与公司收购重组后的价值提升和原管理层的抵抗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损害来比，只是一个零头。

企业的重组变革与国家的变革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国家的重大变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会发生一次，由于案例很少，所以只能进行理论探讨，而很难通过实证方式来寻找一种最佳机制。而企业的变革则是每年甚至每个月都在发生，各种案例汗牛充栋，在这种绝佳的实证环境中总结出来的“黄金降落伞”机制是很值得人们借鉴的。试想，如果在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背上了“黄金降落伞”，对变法后她的地位和利益给予一定保障，她还会那么绝望从而凶恶地扑向光绪和新党吗？还会有此后国家政策的全面倒退吗？她会不会就像王照所估计的那样“公然出头”，支持新政呢？

戊戌的历史已成百年往事，只可凭吊，不可挽回。但我们今天的改革在许多方面也都面临着与戊戌同样的问题——如何妥善处理改革所引起的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利益纠葛复杂就逡巡畏缩，止步不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处理好利益的平衡问题，而不应简单地将问题一刀切、将既得利益者们一棒子打死。否则，轻则改革阻力大增，要经历更多的曲折，重则将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威胁整个改革的成败。在这方面，戊戌变法的教训和“黄金降落伞”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释放阀还是导火索

——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
看改革的时机选择

中国和日本，是人们在研究亚洲国家近代化进程时最喜欢拿来进行比较的两个例子。在受到西方影响之前，两国文化相通、国情相若，随后又在大致同一时期面临西方势力的严峻挑战，并且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境遇不可谓不似。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几乎有天壤之别，日本成功完成了近代化进程，从此脱亚入欧，顺利加入了列强的俱乐部^①。中国却步步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相似的境遇和如此不同的结果，自近代以来，就中日改革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的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栋，也提出了不少见解。然而，不管怎么比较，说来说去都逃不过两个字——太像！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器”的层面而缺乏制度上的改革，戊戌变法由于后党与帝党之间的倾轧而很快中途流产，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中日两国改革的情况还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话，清末新政^②的内容就与明治维新几乎是如出一辙了。日本搞殖产兴业，中国搞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日本搞文明开化，中国搞办学堂、废科举、选派留学生；日本搞富国强兵，中国搞改革饷制、编练新军。就是在中国最经常被人诟病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走的速度也并不比日本慢。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17年后（1885年）才实施了内阁制，23年后

① 由此虽然也引起了日本军国化等问题，并导致后来的种种悲剧，但这已不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② 又称慈禧新政。

(1889年)才颁布宪法,24年后(1890年)才开设国会,30多年后(1899年)才完成各项主要新式民法的立法。而中国从1901年慈禧宣布实施新政开始,7年后(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同时计划再过9年(1916年)[后来缩短到5年(1912年)]就正式颁布宪法,召开国会。10年后(1911年),完成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很明显,像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论是与日本还是与大多数西方列强相比,都是只快不慢的。

双方改革的内容相似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本来明治维新就是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效仿对象。但同样的改革内容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以及结果,就着实让人费解了。明治维新的反应和结果自不待言,除了西南战争这一不大的插曲之外,日本社会对改革基本上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各项政策顺利得到执行,使得日本很快就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借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几乎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政府改革的用心,并且用激烈的反抗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直到把政府和改革都埋葬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政府要禁种罂粟,农民们认为是夺了自己的饭碗,纷纷起来反抗,许多人因此而投向革命阵营。政府要办新学堂,农民却“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各地都掀起了毁学风潮。政府要编户口,老百姓“或曰将以抽丁当兵,或曰将以按人勒税”,纷纷起来反抗。至于政府为了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征收的捐税,自然是毫无悬念地遇到了普遍的抵制。而在改革过程中免不了要出现的一些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是被当成了政府“假改革真剥削”的铁证。

如果说普通百姓的这些反抗还可以用“人民群众受封建统治阶级蒙蔽已久,觉悟不高”来解释的话,那些提前“开眼看世界”,思想觉悟应该比较高的精英阶层们却也毫不待见政府的改革政策。就拿那些原本还希望能够在体制内以改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立宪派来说,1908年宣布的9年预备立宪期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保守的计划,后来更进一步缩短到5年(日本用了23年),可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各省咨议局刚成立没几天,议员们就连续来了3次速开国会大请愿。当政府官员们指出